

2015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安东尼·杜尔《所有看不见的光》:

回念战争,缅怀生命

□孟宪华 姜 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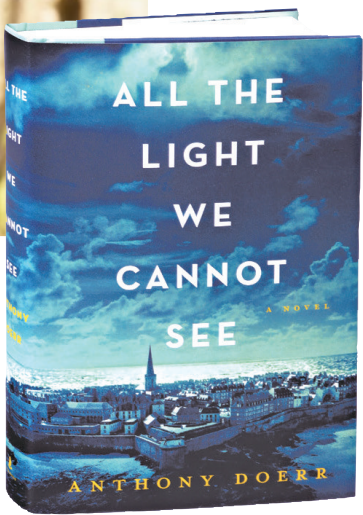


安东尼·杜尔

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战争史。战争作为特殊的社会题材,普遍反映于文学作品当中,战争与文学的联姻造就了战争文学,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基壤,就结出了无数丰盈瑰丽的文学果实,《所有看不见的光》(All the Light We Cannot See)便是其一。

作者安东尼·杜尔(Anthony Doerr, 1973—)为美国小说家,在当代美国文坛备受赞誉,曾获欧·亨利奖、纽约公共图书馆幼狮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作品也曾多次被收入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所有看不见的光》是杜尔的第五部作品,耗时10年才完成,可谓呕心沥血之作。小说不仅提高了杜尔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还入围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

《所有看不见的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着重描写法国和德国两位少年战时的人生历程。玛丽-罗拉·勒布朗是一位法国盲眼女孩,与父亲一起生活在巴黎,通过父亲为她所做的社区模型来辨别道路,基本可以像健全人一样游刃有余地生活。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她十分喜欢阅读,迫切地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维尔纳·普芬尼希是一位德国孤儿,和妹妹一起在福利院里长大,对收音机等仪器设备的构造和修理有过人天赋,正是这一过人之处,使他摆脱了做煤矿工人的命运。1934年到1945年间,本该是玛丽-罗拉和维尔纳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他们的人生轨迹却被战争无情地改变了。巴黎沦陷后,玛丽-罗拉和父亲只得投奔于隐居在圣马洛的叔祖父,父亲被捕后她加入了法国抵抗军,以自己瘦削的肩膀与纳粹分子对抗。而维尔纳则被征召入伍,成为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亲眼目睹了纳粹的种种暴行,对战争的无奈和憎恶始终弥漫在他心头。后来由于前线急需无线电应用技术人才,他又参与到了诺曼底登陆之战中,在圣马洛与玛丽-罗拉相遇、相爱,并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历史、战争、命运、人性与爱情种种



《所有看不见的光》英文版

因素的机缘巧合,塑造了两位主人公普通但不平凡的一生。在他们的生命中,恐怖与希望并存、侵占与抵抗并置、毁灭与创造共生……透过两位主人公不断成熟的内心视角及其人生主线,杜尔意在审视饱受战争摧残的社会和个体,揭露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命运带来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摧毁了人们的生活和家园,人们失去至亲,对和平的向往被践踏……凡是生命中经历过大战的人,不论残害程度严重与否,这一生都会被打上战争烙印。直至小说结尾,读者获知玛丽-罗拉活过了世纪之交,至今健在,她回忆往昔时的心情,不禁让人想起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幸存下来的露丝,她们在白发苍苍之际回忆曾经的情怀是一致的:生命中发生过故事的印记无论历经多久,永远都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故事里所有的人,还有故事外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都永远无法摆脱战争的阴霾和影响。可怕的战争带走了太多的东西,所幸并没有带走所有的东西,希望就是其一。叔祖父家的女管家至死都在跟玛丽-罗拉强调:“你永远不要停止信任,信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你爸爸会回来的”。战争同样无法带走人性之善,小说中主要人物,不管是玛丽-罗拉、她的父亲、她的叔祖父、博物馆的博士,还是维尔纳、维尔纳的妹妹、维尔纳的朋友弗雷德里克等等都是心地善良的人,战争的残酷没有吞噬他们的人性,不论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他们在善良的标尺上同高。除了希望和善良,战争也无法磨灭人们对爱情的向往,全文用80%的铺垫来成就最后20%的相遇——维尔纳和玛丽-罗拉的相遇是如此的平静,却又惊心动魄,绵密飘渺的淡淡情愫,确是爱到深处不后悔的真情,维尔纳舍身救了玛丽-罗拉三次,而他的死则必然成为读者心中的遗憾。战争的硝烟再浓烈,也遮挡不住爱情之花的绽放。

从形式上看,该书最为出彩的就是作者在篇章结构上的安排。小说共有14章,每章虽没有冠以题目,但标注出了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小说情节并非按照时间发展顺序简单排列而成,而是作者有意打乱叙述顺序,把1934年到1945年的各个时间段巧妙地穿插其中,使得本书的阅读更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而在每一章中,作者又分出若干个小章节,并配有标题。这些小章节篇幅短小精练,长不超过十页,短则半页有余。从叙事角度来看,这是杜尔第一次在创作中采用严格的二元叙

述结构,即“AB-AB-AB”的双叙述者手法,极其灵活地在两位主人公之间交替变换,构成螺旋上升的双叙述线索,直到两位主人公相遇为止。杜尔表示,他这样布局的目的是让读者在高度凝练、绵密晓畅的行文中有一个停顿的空隙。写写这个人,然后搁置几页不去管他,继而转向另一个人,这样既让读者有一个舒缓想象的空间,又迫不及待想往下继续跟进。至于大的时间框架安排,由于大部分读者对于二战的历史都比较了解,所以杜尔干脆先把人们已知的战争进程提上前来,从1944年开始写起,然后再转到1934年去描述两位主人公的童年故事,以此为例,时间的穿插旨在将两位主人公在纳粹围城之前的故事,和战争真正打响之后两人的命运同时推向高潮。在阅读过程中,读者会有一种两方线索汇聚一起终于拧成一股绳的快感,同时,对主人公的成长历程和战争的发展历程也有一个全新的阅读感受。

从内容上看,全书洋洋洒洒500多页,作者行文思路严谨,时间杂乱而脉络不乱,人物多而不杂,惊人的细节描写与华丽的比喻修辞足以彰显作者功力之深厚,文中涉及科技、机械、钻石、动植物领域的广泛足以彰显作者知识的广博。逻辑方面,杜尔善于运用合理的伏笔和适当的悬念来控制故事发展的节奏,两位主人公的故事一直交替并行,给人一种平行空间的真实感,格外引人入胜。作者对于环境的描写也同样拿捏得当,既有大段的细节描写,也有蜻蜓点水式的一笔带过。在玛丽-罗拉刚到圣马洛时,文中一处对天气的描述如下:“你可以透过你的指尖感受这里的气候”。短小一句,却是写得柔、细、妙、美。他在遣词造句方面的精准,使得小说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异常生动,画面感超强。有一处写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用了“spiral”(盘旋)一词,读来仿佛亲眼看见音符从收音机中飘出来,在屋内盘旋飞舞,耳闻美妙的声音流淌进耳畔,整个画面本是普通平凡,在杜尔笔下却是活泼的、灵动的,读者能跟他的文字对话,跟他的思维碰撞。

小说的题目“所有看不见的光”,指的是什么呢?是玛丽-罗拉生活的黑暗世界,是战争阴霾笼罩之下的暗无天日,还是战争破灭了人们的梦想,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亦或是收音机发出的电磁波谱?还是二战中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想,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读者自己走进杜尔的字里行间,用心去对话,用情去感受。

战争、爱情和死亡是文学史上,也是人类艺术史上永恒不变的三大主题,大概是因为这三者都会将无法掌控的命运状态和人生结局强行植入个体的生命,且无法内化,无法逃离,永恒存在。《所有看不见的光》将这三者做了很好的结合与诠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该书不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逝去的生命进行了缅怀,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上了贺礼。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姜 凤 译

安东尼·杜尔访谈录:

“另类”的二战书写

安东尼·杜尔的新作《所有看不见的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着重描写法国和德国两位少年的战时人生历程,美国《兰普斯杂志》的南希·史密斯就该小说的创作采访了作者,本刊特刊发译文。

南希·史密斯(以下简称“史”):对于《所有看不见的光》这本书,我最先注意到的是它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这本小说不同于您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小说的结构也非常让人着迷。能谈谈您是怎样或者为何采用这样的结构吗?

安东尼·杜尔(以下简称“杜”):我尝试这种结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试着用各种简短的方式来写作。2005年,在短篇小说《三峡大坝“村庄113”》中,我第一次采用简洁明了的标题形式。后来在《记忆墙》中,我继续使用这种模式,这个故事由简短的章节组成,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标题。在《所有看不见的光》中,叙述者在人物角色之间来回变换,我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

“片段式写作”着实让我着迷。不管是多短的章节,只要能提供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描绘小巧的、可控制的缩影,通过精炼和净化,组成一个个完整的小故事,我都是极为喜欢的。

但是您的说法大致是对的,这是我第一次采用严格的二元结构写作——“AB-AB-AB”的模式,即玛丽-罗拉——维尔纳——玛丽-罗拉——维尔纳……我不断地在两个主人公之间转换,以保持章节的对称。我发现,将一个主人公悬置几页不理,而是转向另一个主人公,这有点像传统的叙事模式,因为读者停留在悬而未决之中,急于想要知道暂停的那个章节里的故事情节。我也很喜欢成组地组织章节,看看创造出来的模式到底是什么样。

最后,我觉得这种结构可以给读者提供反应的空间。我要求读者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紧跟两位青少年主人公的脚步,所以我希望读者能够在章节之间有一个停顿间隙,能看见一些空白的地方,能够在陷进去之前暂时放下一会儿。

史:在阅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整本书的景物描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几乎和人物形象一样让人难以忘怀。书中我最喜欢的部分,有对美丽圣马洛的描写。选择这样一个特定的

时空,您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杜:第一次看到圣马洛的时候,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那是一个被自然环境又壁垒相护的地方。所以,我想捕捉到这个城市的理想状态,这里给我的感觉几乎是幻想与现实掺半。潜意识里,这部小说受童话故事的影响,比如说,维尔纳和尤塔长着雪白的头发,却身处煤烟洼地;福尔克海默是食人魔鬼;玛丽-罗拉是个盲眼姑娘,却比任何人看到的都多等等。要为一个童话的高潮部分选择岛屿要塞做背景,圣马洛看起来似乎是个完美的选择——的确,它是一座有着真实历史背景的城市,然而它也是一座想象的城市。

史:您是如何为这部小说收集资料的呢?很显然,本书的故事要与历史事实保持一致。在历史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您是怎样保持平衡的呢?

杜:我去过欧洲三次,加上大量的阅读,另外还研究过上千张照片。资料空白处,我用想象力加以补充;历史资料可能会为您提供一些细节,但是想象力会给所有这些细节提供方向。对我而言,写历史小说就是在阅读、旅行、观察、想象和梦想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

史:在《所有看不见的光》中,收音机和维尔纳修理机器的本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小说中使用收音机的妙趣何在?

杜:我觉得关于收音机的一切都很有趣,收音机——或许还有飞机,当然还有原子弹——都是20世纪上半叶突出的技术设备。收音机是第三帝国散布谎言、制造恐惧的手段,也是盟军进行抵抗宣传、自由宣传的工具。宏大的政治叙事和艺术叙事都是借此进入人们的生活。

这部小说的重要计划之一,就是塑造一个这样的时代:当耳边听到陌生人或者远方爱人的声音时,感觉那就是奇迹。所以,我致力于呈现收音机出现之前的语言、诗歌和技术细节。在小说的末尾,我努力塑造出一个意象,我们周围一直充斥着视而不见的光,短信、电话、广告等。空气中充满着交流,而这些交流都是由看不见的光来运行的。

史:这本书对时间的处理非常有趣,这在一定程度上和本书的结构和小章节有关,这些小章节在时间上来回穿梭。

贯穿全书的运动感非常奇妙,不管是在小范围内个体的运动,还是大范围内的涵盖全书的运动。您能简单说一下这本书的情节是如何进展的,以及时间所起的作用吗?

杜: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代读者已经十分了解。大家了解诺曼底登陆、希特勒青年团和天屠杀等等相关的信息,至少会知道东线的恐怖。所以就一些较大历史运动而言,大多数读者凭直觉就知道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了。读者知道,德国人将会被驱逐出法国沿岸,而且读者也知道,为此会有很多人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所以,我承认小说所讲的一开始就是已知的。我之所以从1944年开始写这个故事,而不是追溯到维尔纳和玛丽-罗拉的童年开始,就是为了告诉读者:我知道你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我暂时搁置了美国的轰炸情节,使之在接下来的三四百页叙述中悬而未决。

接下来,我试图把维尔纳和玛丽-罗拉在圣马洛前线的命运,以及两人卷入纳粹围城的背景故事同时引向高潮,此举旨在使读者获得许多绳子被编制成一股的感觉。

史:玛丽-罗拉是小说主要人物之一,她双目失明。从头到尾,我都感到可以通过触摸和质感与她紧密相连,当然还有她用来导航的城市模型。这在小说中很不常见,因为我们通常通过描写可视物,而不是描写可感物来建立关联。那么在塑造玛丽-罗拉的感受经历时,您是怎么想的呢?在作品中,我们怎样才能捕捉到这些感受呢?

杜:对于我来说,好的小说创作就是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我最爱的小说家——福楼拜、托尔斯泰、伍尔夫和科马克·麦卡锡,他们都用视觉以外的感官,使我能够脱离自己的生活,走进他人的生活。在玛丽-罗拉的部分,我实现了自我挑战,那就是我不依赖视觉上的细节描写,而是通过尽可能地对她们的世界进行充分、丰富和富有色彩的描写来弥补这一不足。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惟一方法就是,走得再慢一点,平静地呼吸,并且尽我所能地塑造她活着的经历。我想:作为小说家,我们可以运用电影制片人无法运用的嗅觉、听觉、触觉和思维模式,所以干吗不用呢?

我的阅读

我的君特·格拉斯

□杨 沐

德国当地时间4月13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去世,享年87岁。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网上被有关格拉斯的消息、介绍、演讲、访谈、评论刷屏。各大报纸及公共微信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介绍和纪念专栏,恍如15年前格拉斯获诺奖,只是信息覆盖面甚至比当年还广。这位“德国战后文学的旗手”在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后重新被推到前台,他的《铁皮鼓》再次被讨论,诺奖演说辞再次被广泛复制和引用。可能因为报纸的时效性,媒体引用的格氏言论大多来自诺奖演说辞,以及瑞典文学院对格氏的评论和总结:“他肩负起回顾现代史的艰巨任务,唤醒人们所否认、所遗忘的一切。”

而事实上,即便作为写作者,我也相当一段时间没谈论过格拉斯了,而他的书,早就移至书架顶层落满灰尘——作家们写着写着就忘了初衷和伟大作家竖在前方的标杆——这些年更愿意尝试美国式小说,而君特·格拉斯承续的是欧洲式写作,记忆型写作被有意无意地搁浅了。近些年,他的作品很少被媒体提及,大众还有多少人读过被称作“个人的二战史”的《铁皮鼓》?

说来惭愧,有相当一段时间,孤悬的海岛生活让我的阅读跟在每年的诺奖之后。君特·格拉斯恰是按年度跟踪的第一位。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时,我对君特·格拉斯一无所知,尽管王小波提起过他,但他更推崇杜拉斯和她的《情人》。君特·格拉斯被我忽略了,直到他因获诺奖被全面翻译推介。我最先读到的是《猫与鼠》,那本小书竟让我读了一个多礼拜,这当然不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活着的伟大作家的作品,但读过这本书之后,之前看过的作品在我视野里模糊了。我发呆了好几周,不是因为这本小说好到了哪里去,而是小说写成这样,就可以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震惊于找到像老鼠一样窘迫的男孩,在各路猫的围追堵截中走向他命运的方式。而无论老鼠这个比喻,还是各路猫围追堵截的处境,都令我们这种人人似曾相识,如同我们童年、少年时发生过的事——也许我不认为这本书高不可攀正是因为它似曾相识?

世纪末,我出了下岛,阅读只能拜书店经理们所进的那些“纯文学”的书——新旧世纪交替的当儿,“纯文学”这几个字几乎会遭到讥讽。当台风季到来时,我看到了那位敲着铁皮鼓的小奥斯卡。他目睹了战前和战时的德国,以个人视角(一个流浪汉的、被抛弃和边缘化的视角)描述了二战史,以拒绝长大做个人的抵抗。我相信,书中所描述的就是作者眼中战时的但泽(作者的故乡),那样一种强度和硬度的现实,必须通过变形和某个深刻的隐喻才能表达达到骨头里。“他找到了奥斯卡不愿长大这个隐喻,并让这个人物不断敲响铁皮鼓。”这是我的发现——我是一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学徒,在名著中偷偷学艺,自我教育,《铁皮鼓》就这样让我摸到写作的边界。

又转过一年我读到格拉斯的《狗年月》,还是纳粹上台和覆灭那段“狗年月”,还是借此“追溯受难者、失败者和各种人们希望抛诸脑后谎言”,作者继续充当“揭开被捂住伤口的希望的人”之后,我又读到了他的新著《我的世纪》,这是由100篇短篇小说构成的历史长卷。小说从1900年一个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德国士兵的自述开始,到1999年作者母亲103岁的自白结束。这本书让我明白,长篇小说也可以这么写。又过了几年,我看了电影《铁皮鼓》,而且看了不止一遍。这就是我阅读君特·格拉斯的简历,而这位作家对我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如前所述,格拉斯获奖及其作品推介到中国,正值商品经济全面覆盖中国社会生活之时。格拉斯到来时正值我在极力描摹杜拉斯和她的《情人》,事实上,到现在我才真正看出,《情人》写的不仅仅是爱情,而是贫困、绝望、死亡和绝望中的抗争,而这些,需要千锤百炼的语言和沧海桑田的阅历。我当年的苦心描摹只能算是学徒期的练笔,而学徒期的迷惘、自我怀疑以及对痛说家书里短的厌恶、对狂歌式写作的手足无措,导致我价值观混乱,迷茫于写作到底写什么。如果我早点看到格拉斯的诺奖获奖演说辞,比如“真理只能存在于复数形式中,也就是说,不存在作为单数形式的惟一真理,而只有多元真理的集合体”,也许会让我的迷惘和愤怒清明许多。

再比如,我在零星引用中读到过类似这样的句子:“君特·格拉斯为整整一代的国人打破了过去沉默……”我这个笨拙的学徒仅从文本还不太明白《但泽三部曲》到底揭开了什么,以为那就是德国战时的现实,格拉斯找到的是那个世俗的比喻和隐喻。而“打破过去的沉默”,它像一把小刀,划开堵在我眼帘上的、时时作痛的帘子,一堆来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脓液,流了出去;它更像一把扫帚,将挡在我文学路上的群魔扫到了一边;它更像一个隐藏在草丛里的路标,我沿着它走进了“以嬉戏中蕴含悲剧色彩的寓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瑞典文学院对格氏的评价)——它既是世界观又是写作的方法论。只可惜,这种漫长摸索和自我领悟花费我太多时间,当我明白时,轻舟已过万重山。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时段,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也在国内大行其道。《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仅仅是书名已经超出文学的范畴,成为流行语,而对其作品对禁闭生活的反思反倒谈论得越来越少。两位欧洲作家因其作品的疼痛点与我们相似,反思的方向与我们一致,而开启了一种写作方向,虽然这个方向在80年代的中国已经打开。当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心更浮躁,价值观更多样,两位作家的作品逐渐成为小众读物,他们的写作方向也只不过成为少数作家的楷模。

我们这代文学学徒幸运的是,在学艺期间,这个时代伟大作家的作品相继引进国内: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君特·格拉斯、纳博科夫,远一点的乔伊斯、菲茨杰拉德、伍尔夫。当然,我们也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文学教授,在我们经过的日子流逝,去年是马尔克斯,今年是君特·格拉斯。这些养育我们心灵的大师就像一座图书馆,像一肚子学问和人生经验的教父,我们总是从他们那里得到滋养和恩惠而从未有机会表示感谢,我熬夜写就的这篇小文,就算是对大师的最后告别。而霎时间,我心头涌起的是亲人离去般的惆怅。